

李琳琳 著

成为学者

大学教师学术工作的变革与坚守



李琳琳 著

成为学者

大学教师学术工作的变革与坚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成为学者：大学教师学术工作的变革与坚守/李琳琳
著.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6
ISBN 978-7-5675-5426-9

I. ①成… II. ①李… III. ①高等学校—学术研究
IV. ①G6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43242 号

成为学者：大学教师学术工作的变革与坚守

著 者 李琳琳
策划编辑 彭呈军
特约审读 李 莉
责任校对 林文君
装帧设计 倪志强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常熟高专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6 开
印 张 13.5
字 数 244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75-5426-9/G·9636
定 价 32.00 元

出 版 人 王 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前 言

1919年,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基于德国和美国大学教师的职业状况,为青年学子做了“以学术为业”的演讲(韦伯,1998)。在演讲中,韦伯认为大学教师需要将科学探究作为自己的“内在志向”,坚持“为科学而科学”的态度,最终达到“头脑清明”的目标。但从当时大学教师工作的外部条件来看,从事学术工作是一场“鲁莽的赌博”,他建议青年在决定从事学术工作之前要慎重考虑。在近百年后的当下中国,大学教师的职业状况如何?对中国的青年来讲,从事大学教师的工作是一场“鲁莽的赌博”吗?

大学教师是以大学组织为依托,专业化、系统化地从事学术探究相关活动的职业群体。他们从事的与学术相关的活动被称为“学术工作”(Academic Work)。近百年来,志业追求上的吸引力与职业环境的变化共同型塑着全球大学教师的工作生态。作为一种内在志业追求的学术工作,经历了工作内容与工作责任的不断拓展,大学教师不仅要承担学者与教师的双重责任(韦伯,1998),还要担负起科研经费筹集与管理、科研团队合作与协调、社会服务等责任。同时,学术工作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也不断彰显。但是,与学术工作重要性提高相矛盾的是——学术职业的工作环境(如工作稳定性、经费支持、社会声誉、专业自主等)却面临重重危机。

在中国,大学教师的聘任制改革、本科教学评估以及“产、学、研”结合等大学管理变革给大学教师工作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这一系列变革体现了“新公共管理”(New Public Management)思潮中强调“仿市场竞争”、“多样化资金来源”与“表现性评估”的管理理念。这种新公共管理的思潮与中国原有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文化结合起来,呈现出混杂治理的形态。在这一政策变革背景下,本书关注:中国大学教师如何理解当前学术工作的内涵和执行?哪些因素影响中国大学教师学术工作的感知?中国大学教师采取哪些策略应对管理变革的要求?

从这些问题出发,本研究选取两所案例大学,在综合考虑了学校层级、学科、职称等因素的基础上,对 32 名大学教师进行了深度访谈。本书在梳理已有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围绕学术工作的内涵、执行和感知三个方面形成概念框架。在实证研究中,受访者的阐释和理解丰富了这一概念框架,并为学术观、学术工作感知、学者应对策略等提供了本土理解。

本书共五章内容。第一章明确研究背景,梳理和评述国内外与学术工作相关的研究,提出概念框架,明确研究问题,并对研究方法进行说明。第二、三、四章是研究发现部分:第二章包括大学教师理想中的学术工作状态,现实中对学术工作的管理要求,以及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大学教师采取了什么样的应对策略。第三章分析学术工作的优先次序和发展机会,并通过三个典型个案分析学术工作感知的调节作用。第四章关注学术工作管理,包括大学教师在不同学术事务中的参与权和发声权,不同大学教师群体参与学术管理的现状,进而讨论在中观层面上大学、市场和政府的关系。第五章总结本研究的发现,并讨论其理论贡献和政策建议。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大学教师学术工作的时代境遇	1
第一节 全球学术工作管理的历史演变	1
第二节 我国学术工作管理的历史演变	9
第三节 学术工作的理论探究	25
第四节 研究问题、方法及概念框架	43
第二章 理想与现实的角力：学术工作的内涵与执行	53
第一节 大学教师理想的学术工作	53
第二节 大学对教师的工作要求	66
第三节 大学教师的应对策略	85
第四节 本章结语	93
第三章 与变迁共舞：学术工作的感知	97
第一节 学术工作的时间维度与优先次序	97
第二节 学术工作的发展机会：收入、晋升与专业发展	109
第三节 个体的能动作用：三个典型案例的分析	127
第四节 本章结语	137

第四章 学术工作管理	140
第一节 大学教师参与学术工作管理的事务差异	140
第二节 大学教师参与学术工作管理的群体差异	157
第三节 大学、市场和政府	170
第四节 本章结语	177
第五章 成为学者：变革、坚守与不确定的未来	180
第一节 中国情境中的学术观	180
第二节 新公共管理对大学教师工作的影响	182
第三节 学术工作的感知、内涵与执行	184
第四节 学者的应对策略	187
第五节 学术工作的未来发展	188
参考文献	191

图、表目录

图 1	概念框架	50
图 2	研究发现对概念框架的修正	185
表 1	大学内部“传统”与“新公共管理”管理模式之间的对比	3
表 2	访谈对象分布	46

第一章 大学教师学术工作的时代境遇

任何一个职业的发展变化都与其所处的时代紧密相关,大学教师的学术工作也是如此。19 世纪中期,英国大学教师的工作重点是教学,他们通过与学生共同阅读和讨论经典文献培养学生理性思辨的能力,通过与学生同吃同住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的个性养成(Newman, 2012)。相比之下,当前美国或欧洲的大学教师工作任务种类繁多,他们既需要向不同的部门申请筹集研究经费,还要奔走于各国之间参加学术会议和科研项目,更要发表论文,出版著作以满足表现性评价的要求(Slaughter & Cantwell, 2012)。在我国,民国时期的大学教师在“西学”与“中学”之间穿梭,在救亡图存与启蒙民智间徘徊,很多教师在多所大学兼职,按教学课时数领取薪酬(商丽浩,2010)。建国后,大学成为单位制度中的“事业单位”,大学教师成为“体制内”的一个特殊群体。然而,随着我国各行业综合改革的深化,我国大学内部生态也在过去十年间呈现出多种样态。在这一背景下,本研究关注当前我国大学教师的学术工作呈现出哪些特点,这些特点又与学术工作管理的全球性演变以及我国大学教师的管理制度有何种内在联系。

第一节 全球学术工作管理的历史演变

从全球高等教育变革的历史来看,大学教师工作的管理模式在不同历史时期有其各自的特点。下文将分析传统管理方式下“同僚管治”的学术治理形态,以及当前“新公共管理”理念下学术工作的新特点,并重点讨论新公共管理理念影响下的学术工作效率以及国家、市场、大学三者关系的转变。

一、传统管理方式下的学术工作

传统的大学治理强调“同僚管治”(Collegial Governance)。一方面,以洪堡(Humboldt)为代表的学者们认为大学是以“求真”为目标形成的学者和学生社群,学者的自治是大学有效运行的前提和基础(Nybom, 2002),形成了一种以“最少层级和最多信任”为特征大学运行方式,在这样的大学中,自由地探究真理成为可能(Van Vught, 1989; Deem, 1998)。另一方面,学者在自身知识领域的权威性使得其他没有掌握专业知识的人员无法管理大学和学者(Fulton, 2002; Weber, 2008),因此,学者的自治有了双重的合法性基础。这种学者自治的管理模式称为“软”管理(Olssen, 2002),是一种依靠民主投票达成专业共识的分布式管理模式,管理活动由学者社群和学术领导组成,目标在于探究知识和真理。这种工作关系靠信任、道德约束和专业信念来维持。这一模式下的问责是基于同行评议和支持的专家问责。教学和研究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并且这些活动都由大学内部控制,研究是出于学者自身的好奇心,由学者发起和进行。

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大学出现了“官僚科层”的治理形态。官僚科层治理通过制定严格的程序、法律和规章,规定了每个部门特定的权限,并加强了部门间的权限等级依附,形成一个层级分明、决策依赖于书面规定的办事机构(Weber et al., 1991)。Hall(1968)指出科层制有五个主要的特征:1)等级权力。2)劳动分工。3)规则明确。4)程序明确。5)与个人无关。这一管理模式使大学人事、财政和教育内容等都在政府科层管制的规划之下(詹盛如, 2010)。

20世纪70年代以后,长期享受政策资助的大学同政府部门一起受到非议,同僚治理的管理形态因为无休止的争论和浪费时间受到抨击(Smith, 2000)。官僚科层模式也被认为无法处理快速变迁、信息爆炸、知识密集的社会经济体系(Hoogvelt, 1997)。政策制定者认为,大学应该建立起更有效和可行的管理方式(Lee & Piper, 1988),“以有效的管理来弥补减少的资源”(Trow, 1997)。

二、新公共管理理念的引入

“新公共管理”是一种关于公共部门应该如何运行的理论思潮,这一思潮建立在公共选择理论对人类利己行为的假设之上(Kamensky, 1996)。相对于传统公共管理中政府是所有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和监督者,“新”的公共管理理论认为公共部门的管理者应该是企业化、私人化的管理者,他们应该模仿私营部门的管理方法、价值和话语体系

(Hughes, 1994; Denhardt & Denhardt, 2000; Kolsaker, 2008),它鼓励公共部门中的个人以机构的利益作为行为的最高准则(Whitehead & Moodley, 1999; Barry, Chandler & Clark, 2001)。“新公共管理”的主要原则是:政府等公共部门应该关注公共服务的结果和产出,而不是提供服务的过程和规则。它认为采用私人部门的管理技巧有助于提高服务的效率和效能,市场竞争取代集中的科层管理才能使公共财政的“金钱价值”最大化(Meek, 2003)。

Grand 和 Bartlett(1993)认为,新公共管理的主要特点在于:1)消除科层管理中规则—服从的程序;2)强调管理活运优先于其他一切活动;3)引入仿市场竞争的机制提供公共服务;4)评估工作者的工作表现(并鼓励他们进行自我监控);5)用结果问责的机制取代对所有细节都进行管理和控制的机制;6)达到经济、效率和效能的目标。

也有学者将新公共管理进一步细分,Braun(1999)认为存在“效率导向”与“顾客/市场导向”两种模式,前者大都出现在前官僚——学术寡头国家(如:德国、法国与意大利),而后者则是以英国、美国和荷兰为代表。此外,Ferlie 等人(1996)认为还存在着组织精简去集中化、人际与文化、公共服务等模式。

与传统的管理模式相比,新公共管理对于政府与大学关系的改变在于从直接控制转为远程操控。政府对大学的管理实现了从“控制”(control)到“监管”(supervision)的变化(Neave & Van vught, 1991)。政府的角色不在于主动提供服务,而是代理顾客或消费者来督促大学提供高品质和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所以政府愿意增加大学的“程序自主”程度,让他们自由决定如何达成目标,但是在“实质自主”方面,却已经被经济理性取代(莫家豪 & 罗浩俊,2002)。

表 1 大学内部“传统”与“新公共管理”管理模式之间的对比

	新公共管理模式	传统模式
控制模式	“硬”管理;管理者和聘任者之间的界限分明;专制式管理	“软”管理;民主投票;专业共识;分布式管理
管理活动	管理者;直线管理;成本中心	领导者;学者社群;专业人员
目标	最大化产出;经济利润;效能	知识;研究;探究;真理;理性
工作关系	竞争性;层级性;市场指向的工作量;机构忠诚;对大学不能有负面批评	信任;道德约束;专业信念;自由表达和评论;公共知识分子
问责	监控;评估;消费者导向;表现指标;基于产出	专家官僚;同行评议和支持;基于规则

	新公共管理模式	传统模式
教学/教育	学期制;课程简化;模块化;远程学习;暑期学校;职业性	学年制;传统的课程评价方法;为知识而知识
研究	外来资金支持;与教学分离;被政府和外部机构控制	与教学联系紧密;大学内部控制;学者自身发起和进行

来源: Olssen(2002)

此外,新公共管理也使大学内部的管理活动和学术工作出现了新的特征。Olssen(2002)对两者进行了对比(见表1),管理活动开始以成本为中心,管理者和聘任者之间出现了明确的界限。大学教师群体内部根据职务和职称出现了层级,教师之间的竞争关系更为明显,教师的工作内容和工作量的分配都以市场为导向;教学工作出现了简化课程,模块化教学,强调对学生的职业培训,满足学生作为消费者的需求等趋势;而研究工作更多地接受外来资金的支持,被政府和外部机构控制,与教学工作分离开来。

三、新公共管理理念对学术工作效率的影响

在新公共管理这一理念下,学术工作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关于这一变化,有两种相矛盾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新公共管理方法提高了学术工作的效率。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它非但没有促进效率,反而使学术职业出现了“去专业化”的趋势。

赞同新公共管理提高学术工作效率观点的研究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论证:

首先,新公共管理强调最小化成本和最大化产出,提高内部效率(如单位学生的成本)和外部效率(如研究成果及毕业学生的类别和品质能否适应社会及经济的需求),解决了高等教育规模扩大带来的经费问题(Neave & Rhoades, 1987; Kogan, Moses & EI-Khawas, 1994)。政策制定者们认为大学长久以来都从公共财政中获得大量的经费,却很少知道这些经费产生了什么样的效果(Davies & Kirkpatrick, 1995)。他们认为大学应该建立更具执行力的管理方法(Lee & Piper, 1988),让“有效的管理来弥补经费的短缺”(Trow, 1997)。政府对大学的资助从“建立在投入基础上的资助”,转变为“建立在成果基础上的资助”(Barnett & Bjarnason, 1999; Brennan, 1999; Waitere et al., 2011)。国家的财政部门是基于合同的方式从大学中“购买服务”,而不再是“资助”他们(Williams, 1992)。

其次,新公共管理引入多元化的资金,通过“仿市场”竞争的方式配置资源,提高了学术工作的效率,顺应了全球化竞争带来的挑战。一些学者认为国际化是教育与学术发展的内部要求。学生和学者从学习其他文化和体系中受益,知识基础也得到扩展、研究的广度和声誉也得到提升,课程也更为丰富。这样的交流与学习也有助于维护全球的政治和经济稳定(e. g. Bruch & Barty, 1998)。Scott(1997)甚至提出“所有的教育都应当是国际化的教育”。但需要看到的是,全球化在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更多的挑战。它要求高等教育在活动、能力、过程和信念等方面都国际化(Knight, 1995)。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大学以及处于劣势地位的大学(Moja & Cloete, 2001)。他们不但要继续承担高等教育扩招和为国家服务的职能,还要在本地区的环境中不断调整自身的角色和位置(Teichler, 1999; Enders, 2004)。

在这样的全球化竞争中,高等教育采用新公共管理的理念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应对挑战: 1)教学活动成为一种有偿服务、大学生成为消费者和商品。学生入学之前,大学将本校的教育作为一种服务向全球的学生宣传,希望招收到高能力和能担负高学费的学生。入学之后,就进入大学教育服务向学生的人力资本转化的进程。而在毕业时,面对国际劳动力市场,学生的身份又发生了变化。他们作为大学的产出和商品,带着大学的标签和符号,被提供给用人单位。同时,作为大学的校友也成为潜在捐赠者。2)科研成果通过出版、发表、专利与商标申请等途径,成为受法律保护的个人财产(Bok, 2003; Slaughter & Rhoades, 2004)。传统的知识观将知识作为公共财产,Merton(1968)提出的公共学术四原则——知识社群自治、成果人类共享、知识自由流动、怀疑精神,就是最典型的代表。但在新公共管理理念下,科研成果被运用到产品的生产,通过全球市场使公众的生活改变,但公众必须向科研成果的所有者付费,这在一定程度上激励了新知识的生产。3)竞争与流动作为大学优化资源配置的方式。不同国家的高等教育体系之间、大学之间、学院之间、大学教师之间都进入到竞争之中,他们竞争生源、声誉、优秀学者、经费资助、科研成果等所有有助于大学发展的资源。也在学术工作、人员任用、基础设施、服务提供等许多方面采用分散交易(unbundle)的方式进行改革(Slaughter & Rhoades, 2004)。

与之相反的观点认为,新公共管理根本无法提高学术工作的效率,甚至将大学教师的工作“去专业化”,持此类观点的学者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论证。

首先,新公共管理根本无法提高学术工作的效率。1)那些不生产交换价值的学术工作和部门无法得到维持。市场活动越频繁,那些不与市场直接联系的工作和部门越

难以生存(Slaughter & Leslie, 1998; Geuna & Rossi, 2011; Ylijoki, 2003)。2)即使
在那些积极寻求与市场相结合的部门与学科,学者们也只是将自己的研究“包装”成为
看起来应用性更强的研究。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也在实践上使得
学者们可以继续按照自己的方式进行研究(Calvert, 2000)。3)强调学生作为消费者,
造成了教师和学生之间的紧张关系。市场的交换双方,是基于合同的平等和制衡关
系,但是在教育关系中,教师与学生之间并非如此(Marginson, 1995)。4)过于强调效
率和交换价值会导致产品的一致性和标准化,影响多样性和创新性。那些标准总是由
竞争中处于优势的机构做出(最好的大学、学系),而其他机构和部门的工作则在竞争
中被迫与其保持一致(Hou, 2012; Marginson, 1995)。5)学者之间的竞争以及知识的
商品化不利于知识的传播和共享,有实证研究表明,知识商品化越强烈、越强调经济效
益的学科,不求回报的知识共享的可能性及水平越低(Shibayama et al., 2012;
Festre, 2010)。6)对传统教学和科研的联结带来危害。很多以市场为基础的研究与
教学分离开来,成为独立的专业中心。此外,本科教学与研究生教学、研究被分离开
来,本科生的教学更多是知识的传递,而研究生的教学和科研更偏重知识的探索
(Marginson, 1995)。

其次,新公共管理改革导致了大学教师工作的“去专业化”。专业社会学中的特质
模式认为,专业必须具备一套专业知识和一个为集体服务的理想(Parsons, 1968;
Wilensky, 1964)。而权力模式的学者们认为,专业是有较大控制权的职业,这种控制
权可以表现在这三种层面:对市场的控制权、在与当事人关系上的控制权、对分工制
度的控制权(曾荣光,1984)。大学教师在知识生产和传播上的工作特性决定了他们在
专业知识方面成为“关键的职业,培养其他所有职业的职业”(Perkin, 1969),形成了对
专业知识的垄断。学术组织的成立也使其成员有了同僚管理的自主权。而学术工作
作为一种追求科学精神和价值的职业(韦伯,1998),在社会服务以及科学进步、人类整
体的长远发展方面的追求,也符合专业忘我主义、客观的、一视同仁的服务态度以及赢
得社会大众信息等特征(Amaral, Magalhaes & Santiago, 2003)。从权力模式来看,这
一时期的学术职业对于市场的控制力较强,特别是在招生市场以及知识应用的市场,
大学都拥有较多的自主。同时其在对于学生以及用人单位等当事人的关系上,也有相
对较高的权威。分工方面,虽然存在一些短期、兼职人员的聘用,但大学教师群体对其
有绝对的裁决权。在这一时期,学术职业内外都形成了学术作为一种专业的共识:研
究成为学术工作的重点、对知识的追求作为终极目标;学科组织是追求真理的最佳形

式;国内与国际的同行评议是学术声望建立的基础(Gappa, 2001)。

但随着新公共管理理念在高等教育领域被广泛采纳,更多的学者开始讨论“学术专业面临的危机(Enders & Teichler, 1997; Enders, 1999)”、“21 世纪是否还存在‘学术专业’(Williams, 2008)”:

- 1) 学术职业作为专业的公共服务理想受到质疑。高等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张使得大学的社会经济地位在不断下降。再加上政府财政投入紧缩,大学不得不参与市场活动来维持自身的发展。但学者们采取的学术资本主义行动策略使得专业团体声称的利它性、忘我主义等公共服务的原则受到损害。
- 2) 学术工作的专业自治和专业权力被强有力的官僚和市场问责击垮。新公共管理方法强调的问责和表现性评价彻底颠覆了社会大众对于学术职业的信任文化。传统的自由学术的话语体系面临消亡,学术的问题不再是“它是否是真实的?”而是“它是否可以卖?它是否有效?”(Lyotard, 1984)。
- 3) 学术工作从业人员的多样性也使得学术共同体对于分工制度的控制权降低。大学急速扩张带来的财政压力,使得学术职业的从业人员结构复杂化,Handy(1998)将这一时期从业人员的特征归纳为:萎缩了的专业核心,只有一小部分有能力的人代表大学的核心竞争力;日益增多的基于科研项目的短期工作人员;日益增多的以小时付费的、没有专业发展前景的教学人员。

四、国家、市场、大学之间的关系

Clark(1983)曾提出一个被广泛引用的协调三角(the triangle of coordination),认为政府、学术寡头和市场是三股影响高等教育形貌的主要力量。政府权力代表的是社会的集体意志;学术寡头由资深教授组成,其影响力来自知识和专业的权威;市场则是个别消费者的意愿。各个国家的高等教育体系中,这三者的强弱差异塑造了各自不同的特征。比较极端的包括解体之前的苏联(偏向政府权力)、意大利(偏向学术寡头)及美国(偏向市场)。

1980 年代以来,各国高等教育治理政策的改革使得这三者的关系不再是此消彼长的强弱较量,而是出现了不同力量间的微妙融合与交织,呈现出更加复杂的动态图景。Williams(1992)认为,在高等教育供应者和消费者之间,政府可以随人力的需求和政策导向扮演三种不同的角色:第一,政府作为仲裁者,保障高等教育供应和消费之间的公平性。第二,政府作为促进者甚至供应者,确保高等教育的充分供应和社会结构的稳定。在这一角色里,政府和高等教育机构的立场是一致的。第三,政府支持消费者甚至自己作为高等教育的独买者,扮演消费者代理的角色,政府和高等教育消

费者的立场是一致的。传统上,国家大多扮演供应者的角色。但最近,各国政府逐渐由以往对高等教育的支持变为对消费者的支持,更多的是扮演仲裁者和消费者的角色。

在新公共管理理念的影响下,市场的力量是否增强?政府的力量又是否因此削弱?这一问题存在较多讨论,一种赞同市场力量增强的观点认为,在大学之外出现了联系大学和企业的媒介机构,在大学内部也出现了指向企业需求的纵向机构(Slaughter & Rhoades, 2004)。大学内部的讨论、话语体系和技术都被市场和竞争所主导(Bruno, 2009; Pestre, 2009)。新的研究经费都流向了与市场结合的部门,市场几乎操控了大学。但由于不同国家高等教育体系都有其独特的治理背景,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市场力量增强的路径是不一样的,Slaughter 和 Cantwell(2012)对美国 and 欧盟进行比较后认为,市场力量在两个地区间都有所增强。但美国高等教育中的市场作用独立于政府机构的意志,甚至先于政府法律 and 政策的出台。而欧盟则是在政府主导 and 监控下,引入了仿市场的竞争机制。

另一种反对的观点认为,新公共管理的变革没有削弱政府的力量,反而增加了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控制(Dale, 1997)。Mok(2009)认为新公共管理其实是一种“国家集中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结合,在这种形态下,国家仍有主导规划能力,但是却透过自由市场的机制来达成这些目标。只是借用市场的概念进行资源与合法性的再分配,政府或国家机器仍然是最终的裁判者(Zhan, 2010)。大学自主 and 市场力量发挥的程度,基本上还是由政府来界定(戴晓霞, 2000)。“依仗国家命令权力产生的依赖性结构”中逐渐引入“依仗利益 and 资源产生的依赖性结构”,这两者结合在一起,共同维持了大学教师这一精英群体对国家的依赖。市场机制的运作显然不是“价值中立”,而是承载了政府意志 or 政策企图的平台。更重要的是,这个市场不是完全竞争市场,而是建立在政策“偏好”上的运作架构(Jongbloed, 2004)。政府提供的高等教育经费预算强调产出 or 表现,视学校对消费者的满足程度来进行经费的划拨(Dai, 2000)。

在大学内部,这种新公共管理理念又对学术寡头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政府的这种“远程调控”的机制将高等教育的财政责任以及一部分决策权下放到了大学和院系层级。这也使得大学的中层管理者掌握了较多的权力和主动权(Marceau, 1993; Marginson, 1996; Currier, 1998),相应的,管理者和学者之间的差别也越来越明显(Currie and Vidovich, 1998; Deem & Johnson, 2000; Deem, 2003; Deem & Brehony, 2005),大学中的管理者大多来自学者群体,他们多被称为“学术领导人”(academic

leaders),而不是“管理人”(manager)或“首席执行官”(chief executives)(Deem & Hohnson, 2000; Deem, 2003)。Bessant(1995)对一所澳大利亚大学的研究发现,那里的高层管理者已经成为一个独立于学者的群体,他们采取公司式的管理实践。一方面,学术领导人来自于普通学者,他们中的一部分认为自己是“非自愿的管理者”(reluctant managers),只是暂时担任管理职位,并不将它作为自己职业发展的一条路径,他们更愿意代表学者自身的利益,试图维护学术自由和学者自治的传统(Deem et al., 2001);另一方面,受到新公共管理的影响与要求,作为管理者的他们又需要促使学者达成公共问责、经济有效和顾客满意等管理目标。实践中,学术领导人多会采用一套“双重话语体系”来调和多种价值和文化的冲突(Winter, 2009)。他们可以理性地分析大学变革的影响,合理适度地适应其中有利的方面,规避和屏蔽对学者群体的负面影响。也可以盲目顺应变迁,成为新公共管理体系的工具和媒介。因此,学者管理层在大学变革和发展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Barry, 2001)。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发现,在诸多力量的影响下,全球学术工作的管理都面临着不断变革。虽然有着相似的新公共管理的变化趋势,但基于不同国家的管理背景和传统,大学、政府和市场对学术工作发生影响的机制并不一致,三者对学术工作的控制力谁消谁长或是共同增长,都有待进一步研究。同时,新公共管理是否能够促进学术工作效率的提高、学术工作是否在这种管理变革下出现了“去专业化”的趋势都存在较多的争议。

第二节 我国学术工作管理的历史演变

西方与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共存,并获得独立的发展,但源于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发展出了完全不同的理念。实际上,中国古代甚至并没有发展出可以称得上“大学”的机构(Hayhoe, 1996)。

到了清朝末期,西方的教育体系作为现代化的一个标志被引入中国。1898年,京师大学堂的建立标志着我国近代大学的正式诞生(郑登云,1994)。大学堂“择中国通人,学贯中西,能见其大者为总教习,然后可以崇体制而收实效”(蔡克勇,2003)。中国传统教育体制下的“教育官员”演化为大学堂的“教习”,标志着中国现代大学学术职业制度的萌生。而1903年的《奏定学堂章程》规定大学堂教员可分成正教员和副教员两种,并对其文凭进行要求,同时明确了大学学术职业梯级,并开始重视学术职业者的学